

毛泽东的社会管理思想探索

黄建军^{1 2}

(1.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2.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丰富的社会管理思想:采用革命化的社会管理理念,强调劳动者直接参加国家管理,实行公社化的管理体制,采用自上而下的政治指示的管理运行模式。这些管理思想蕴含着鲜明的方法论特点:依靠国家政权组织调控社会,通过政治性的群众运动来实现社会发展目标,强化意识形态的管理功能,这些给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留下了诸多宝贵财富。

关键词: 毛泽东; 社会管理; 主要内容; 方法论特点

中图分类号: A 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219(2013)02-0024-05

无产阶级政党推翻旧政权,建立自己的新政权后,就存在一个对新的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重大问题。对此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已经作过探讨,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方法,毛泽东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则发生在一个东方大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程度与西方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别,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我们走到一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摆在毛泽东和全党面前的首要历史课题是:究竟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何才能巩固、建设和管理社会主义。毛泽东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管理问题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社会管理思想,对于我们分析今天社会主义建设中所遇到的现实问题,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也为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来源,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毛泽东社会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成为执政党,工作重心也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改造旧的社会制度,建设新社会的制度和新秩序,需要摸索学习管理城市和进行社会

建设的诸多技能。当时虽然没有明确使用社会管理这一概念,但是所要做的工作都是新政权建立过程中需要考虑的社会管理问题,从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执政就是管理。

1. 革命化的社会管理运作理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的客观环境,国际国内形势非常不利于社会建设,帝国主义国际反动势力仍然进行战争叫嚣,因此,如何维护社会稳定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怎样改造旧社会管理新国家、如何尽快恢复发展经济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要面对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毛泽东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借鉴苏联共产党执政的经验,采用革命化的社会管理理念,把这些理念运用于实践,以革命的手段维护社会稳定,以革命的思维考虑经济建设问题,有效维护了社会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具体表现为:

首先,采用革命手段坚决镇压国内外反动派对革命政权的反抗和破坏。马克思曾指出“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政局下都需要专政,并且是最强有力的专政。”^[1]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内国外敌对势力的虎视眈眈,非常有必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专政职能,解决对内对外两个方面敌我之间的矛盾,以保卫新政权。对外,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与

收稿日期:2012-12-27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学与中国实践的验证”(苏教社政[2010]2号);南京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专项任务项目一类课题(SZJ11101)。

作者简介:黄建军,男,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访学博士生。

美帝国主义进行了艰苦的战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进行国内建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同时提升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威望。对内,新中国为彻底清除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党领导人民在全国范围内部署了大规模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的政治运动,这是建国初期进行的一场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安定社会秩序的复杂的斗争。这些为正在进行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和即将开展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营造了安全稳定的国内环境。

其次,采用革命手段为新政权的巩固奠定物质基础,以革命的思维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是一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物价上涨失控的烂摊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就进入了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毛泽东指出应自觉地把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放在重要地位,依靠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力量,采取了一系列革命化的措施,通过米棉之战和银元之战稳定了市场,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了国营经济,进行土地改革,重视保护民族工商业,同时取消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废除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新生政权迅速稳定了金融和物价,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交通特别是铁路运输得以恢复,恢复和发展了工商业生产和贸易,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

毛泽东认为,通过抓革命,可以把人们的工作热情激发出来转化为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虽然成功了,随之而来追求物质利益的动机却能腐蚀人们的思想,诱使人们的理想信念陷入颓废和虚无,革命的纯洁性受到损害,只有具有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会像过去的革命工作一样走向新的胜利。同时,运用革命化的管理方式,可以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把上层建筑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成分进一步进行清除,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是新中国初期“抓革命,促生产”指导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的运作理念。

2. 重视人民参与社会管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强调劳动者直接参加国家管理,毛泽东从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十分重视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人翁地位,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而且在实践中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强调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前提下,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必须让人民享有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这也是毛泽东社会管理思想中一个核心理念,在毛泽东

的管理思想与实践活动中表现得非常充分。

新中国刚刚成立后,国际国内环境极其复杂,面对内忧外患交织、经济百废待兴的局面,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仍然要如革命战争年代一样紧密地依靠人民群众,社会主义事业没有群众的参与、支持和推动同样不可能成功,“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2]他认为不仅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事业,党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者,必须要有群众的支持,社会主义事业“单有党还不行,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要有群众。我们的各项具体工作,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等工作,百分之九十不是党员做的,而是非党员做的。”^[3]⁸⁸因此,依靠人民群众参加社会管理,进行社会建设是毛泽东的坚定信念。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他多次告诫各级干部务必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强调只有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群众是最聪明的,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领导和管理干部在工作中遇到了难题,不要冥思苦想,要到群众中去找办法,让群众帮助出主意。

毛泽东认为国家要保证人民管理社会权力的实现,还必须实行人民民主。对于如何保证人民行使民主权力、当家作主这一问题,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当他向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将如何跳出这一历史周期率问题时,毛泽东曾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4]。在毛泽东看来,民主是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人民权益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保证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如果只是政府单方面替人民群众作决定,就可能违背人民的意志,其结果只能损害人民利益。在保障人民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加强社会管理上,毛泽东再三强调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是人民参加国家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1950年6月,他在中央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会议的闭幕式上,还强调社会主义管理的经验就是对人民“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3]²¹²

3. 实行公社化的管理体制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非常高涨,毛泽东也理想化地看待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依托苏联的经验模式强化“大”而“公”且“纯”的社会建设,他也

毫不掩饰地表露出欣喜之情,认为“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5]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我们都没有见过。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毛泽东一直希望为中国人民建立一个不同以往的理想社会。面对当时大好形势,毛泽东也精神振奋,激起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美好社会的冲动,萌生了在有生之年就建成共产主义的愿望,甚至以赶超英美为口号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过高地估计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生产力的影响,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并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一再变更生产关系,又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到1958年底,全国74万个农业合作社已经合并为2.6万个人民公社,此后的20年时间里,人民公社制度就成了中国农村基本社会经济制度,是实现经济生产和社会管理的统一主体。不断进行建立一种理想社会模式的实践,对理想社会模式的憧憬成了这一时期毛泽东社会管理思想的一个中心内容。

人民公社最大的特点是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公社既是农村基层政权机关,又是农村经济、文化、生活单位,在生产资料上实行单一的公有制。毛泽东对所有制的问题非常重视,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决定着社会制度的性质,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就越接近共产主义,也越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人民公社要逐步发展起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制度,并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6]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人民公社成立后以“社”为基本核算单位,采取生产资料公社所有制,废除一切私有财产,甚至把农民的私有财产等全部收归公社所有,公社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生产、劳动、管理、核算,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管理,但农业生产的计划、田间管理等都由公社决定,大队和生产队在生产和分配上都无自主权,尤其是分配权,基层也缺少管理的资源,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这种状况引起了广大农民的惊恐和不满,纷纷杀猪宰羊,砍伐树木,给生产力的发展一度造成了很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可以说,人民公社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理想的社会发展和管理制度,也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4. 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模式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在社会管理体制方面基本是把苏联模式借鉴过来,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央政府亦把全国各项工作的管理纳入手中,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逐步形成,地方的权力来源只取决于中央政府,缺乏自主性。当时甚至还想在城市中也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宣传的口号就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大而公的理想化发展模式同样体现在现代工业经济和城市的管理方式上,中国的城市很快形成一个和行政管理体制紧密结合的单位体制,社会管理采取了高度行政化的“单位体制”,单位制延伸到整个社会和经济系统,这在当时无论对经济还是社会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依靠单位构建的一元化的社会调控体系,个人生存资源的分配权利被单位垄断,整个社会的资源分配被国家垄断,不仅构成了“国家-单位-个人”的支配链条,还形成了“个人-单位-国家”之间的依附链条。国家管理体系把“单位”作为社会,“社会”成为政府的下属,个人以其归属的单位来定位自己的社会地位,政府则通过单位来实施它的社会管理职能。这样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国家对整个社会具有强大支配权的同时,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另一方面,单位和个人享有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也越来越匮乏。

因此,无论从革命的或运动的社会管理方式而言,当时的中国在农村公社和城市单位实行的都是自上而下政治指示的管理运行模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国家经济职能极度扩张,对社会高度控制。从经济方面看,就是通过行政性的力量计划生产、销售、分配、流通的各个环节,不但支出的社会发展成本过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从社会领域来说,这种全民政治生活的齐一性反而更容易导致国家发展的失序,社会被国家权力所渗透,所覆盖,整个社会流着国家行政体系的血,靠着同样的血脉系统来新陈代谢显示生命,公社和单位制主导下的社会管理构架使基层社区在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降低甚至日益边缘化,也极大地浪费了发展的社会资源和时间成本。当然,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实行这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通过政府对社会发展进行协调和干预,一定程度上调度了社会资源,社会被纳入到国家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减少了各种不稳定的因素,对于毛泽东时代社会发展的高度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二、毛泽东社会管理思想的方法论特点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历经曲折,在几十年的革命和

建设中形成的社会管理思想,内涵非常丰富。他针对管理对象、管理目标、管理过程等,提出了一系列特色鲜明的管理思想,开创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管理方法,这些管理思想蕴含着鲜明的方法论特点,它既不同于传统的管理方法,也有别于经典作家提出的一些管理方法,而是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论特点。充分研究毛泽东社会管理思想所蕴含的方法论特点,不仅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思想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为我们以后进一步坚持、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管理思想也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依靠国家政权组织调控社会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由中央代替政府行使权力,普遍存在着党政职能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造成了党内民主缺失,政党体制不能有效运转,脱离法制化的轨迹,滑向高度集权的政治运作的轨道。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依靠单位制实施运作,在单位的上面,则有层层行政区划的各级组织,中央政府就是最高层的组织。这种体制有以下特征:“第一,整个组织是中央高度集权的,……其主要职能是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第二,从单位到中央,所有层次的组织在结构上是同质的。”^[7]这种体制使社会组织结构呈现出一种“蜂窝状”,整个社会中所有的机构和个人都把政治当成职业,把履行国家职能作为目标。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使得国家的经济职能也迅速扩张,对社会控制程度高。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民众独立谋生的经济基础,在当时的中国完成了城市工商业改造和个体手工业集体化改造之后,这种体制的基础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以前,“整个国家就是以革命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只是作为一个革命的要素被配置到整个民族危机的解决方案中。”^[8]由此一来,这种利用国家政权调控社会的政治运动一旦开始运作,短时间内就很难改变,新中国成立后整个社会运动式的管理和政治化改造,就一直表现出这种难以改变的刚性特征,继续依靠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性手段对社会、经济领域中各种资源统一配置,这种密集的政治改造和经济计划使神州大地和全国人民经受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结果形成了只有国家而没有社会的状态。

2. 通过群众运动推进社会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管理人才十分缺乏,以至于到了1960年,毛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斯诺时还用“一穷二白”来描述当时的社会状况。为了尽快实现“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一目标,沿用革

命时期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一些优势和经验成为党的一个必然的选择,希望通过普遍的政治性群众运动来实现经济目标,这种“运动式”的社会管理方式使得中国长期没能得到培育成长的社会显得非常脆弱,以高指标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整个社会的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不断蔓延,人民公社所实行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等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使得农村公社完全游离于劳动生产部门之外,已经不再是单一的经济组织范畴,从组织形式上来看,与革命时期的军事化组织基本没有实质差别。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党在建国初期一段时期内的社会管理工作,几乎都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形成于革命年代的革命式管理的痕迹。

群众运动是毛泽东偏爱的政治动员方式,他曾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9],认为只要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就什么事情都能办到。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通过群众采取各种措施开展自救运动,比如在经济困难时期,1938年开始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国共产党在其控制领域内实行的军队屯田和鼓励生产的群众运动,使军队不仅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克服了经济困难,而且也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达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共度难关,既进行革命,又进行生产自足的目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依然钟情于通过群众运动来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认为革命年代领导群众运动的经验也可以搬到社会主义建设中,通过群众运动,发动群众,革命事业就无往而不胜,过去革命年代的实践已经证明,如今也完全可以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10]毛泽东不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比革命战争更难,在他的领导下发动了多起群众运动,从1950年冬开始土地改革运动,其后不久的“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到1957年开始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以及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在广泛发动群众运动得情况下进行。毛泽东认为只有群众运动才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搞社会主义群众发动得越广泛,越深入,越持久,社会主义的力量就越大,因此他反对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不适宜搞群众运动的说法,把群众运动看作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法宝。

3. 强化意识形态的管理功能

意识形态是一个政党公开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是政党动员和联系其他社会力量的基本手段,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至关重要。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社

会管理是以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改造旧社会、建设新中国、加速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为主线,其中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政治工作和革命性的政治运动对有效的社会管理起过很大的作用^[11]。这也是我党在社会管理方面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中国共产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就必须坚持并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社会中多样化的思想和观念进行调控和引导,以凝聚人心,增强执政的合法性。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从旧社会脱胎而来,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痕迹,旧社会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等东西,仍然影响着广大劳动人民,起着腐蚀、侵袭的作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可能较快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旧社会的意识形态并不会随着旧的上层建筑被摧毁和旧的经济基础被消灭而迅速地消失,相反,还会借助它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有的优势,同社会主义作反复的较量。同时,围绕政权问题,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反动阶级总是要使用两手,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反复围剿,妄图把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当武力进攻和军事威慑不能奏效时,50年代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这也引起了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关注,帝国主义国家以“和平演变”为主、以军事实力配合的战略,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瓦解、颠覆,妄图通过这些实现“不战而胜”的目的,就是这一斗争形式的突出表现。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改变斗争策略,并且紧紧抓住和平演变这个问题,及时地向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教育,以提高人们对帝国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已经处于执政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鉴于和平演变危险的现实存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把警惕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及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危险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了出来,也表明了毛泽东具有无产阶级理论家和战略家的理论坚定性和政治预见性。

三、结语

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充分借鉴苏联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并汲取了中国传统历

史文化中治国理念的精华,在领导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的过程中,在总结执政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开创性的社会管理理论。他在社会主义社会管理问题上的探索取得了相当成效,在整体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目标进行设计的同时,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也进行了全方位的指导和部署,及时把握和处理了社会管理中的各种矛盾和关系,提出了一些富有特色的管理方法,不论是通过国家政权强制措施进行的社会管理控制,还是人们思想上出于对党的领袖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热爱,都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保持政治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稳定也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社会在加速转型,社会变革加剧,中国也到了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日益增多,机遇亦和挑战并存。在这样的新情况下,我党面临着继续执政的严峻考验,这对党的执政能力和社会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毛泽东管理思想将对我们党及其各级管理者继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相信对毛泽东社会管理思想的研究会越来越科学全面,毛泽东的社会管理思想也将指导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必将引领我们继续走向新的胜利。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
-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8.
- [3]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4]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144.
- [5]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274.
- [6]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22.
- [7] 李强.后全能体制下现代国家的构建[J].战略与管理,2001(6):82.
- [8] 苏志加.革命的社会管理和社会管理的革命[J].大连干部学刊,2011(8):33.
- [9] 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62.
- [10]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66.
- [11] 熊芳.论毛泽东改造主观世界的思想及其启示[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

[责任编辑:赵秀丽]